

60712 3/21

0090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

王洪模 郭德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91年7月

论文提要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社

会之所以需要改革，一是因为它和其它社会一样，都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变革，二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各国的共产党人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其在本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三是我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对外开放，也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不行了，才需要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因为国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国外还存在着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他们总想把中国拉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就会走错方向，陷于失败。

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方面，党中央已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同时又坚持和发扬过去的好经验、好传统、好做法，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划清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界限，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正确地加以引导；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从总体和长远考虑，采取若干战略措施，以保证改革开放持久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磅礴于祖国大地，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人民对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得到深化和理论上的升华。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散布种种谬论，歪曲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妄图将其引向“全盘西化”的轨道，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这种情况表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弄清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澄清理论与政策是非，总结历史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就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一探讨。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年月，有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什么“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产物”。这种说法，不仅在政治上别有用心，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众所周知，任何社会都要在矛盾运动中发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因为它和其它社会一样，都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变革。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在基本适应的情况下存在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在总体上不再需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革和调节来完成。因而，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只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基本的理论原则，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各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建立与别国不尽相同的具体制度。列宁曾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也是这样。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更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需要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特殊情况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我国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矛盾，要在解决这些矛盾中去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扬成功的方面，纠正失误的方面，这也需要改革。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结合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也会遇到许多新矛盾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1936年，苏联宣布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苏联的领导层和理论界的某些同志，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已经不存在矛盾了，苏联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在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在我国的某些同志中发生了影响。而在同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恰恰暴露出在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亟待解决。于是，如何正

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统一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将都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3）毛泽东还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教科书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正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理论界，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矛盾问题存在分歧认识的时候，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统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了那种用僵化和停滞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澄清了长时期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思想混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一个飞跃。我国后来的改革实践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实行改革确实具有必要性。我国在50年代初经过三大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远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和优越。我国所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等基本制度，都是好的。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初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这种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由于当时需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体制的特点，学习了苏联的某些做法，建立了一套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

于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动员大批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是需要的，而且当时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发展规模的越来越大，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在农村，则长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生产管理上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集中劳动；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工统一分配的制度。这种管理上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大呼隆”、“磨洋工”，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的局面。与这种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我国在政治上也形成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实行对外开放，也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国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加密切，分工更加细致，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去实现。另外，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同样可以为其他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所利用。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应该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所有成果，来为自己服务，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

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党本来是十分重视进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以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实行闭关自守，结果给自己带来一些困难，影响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对于以上问题，党中央早就有所认识，并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指出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些弊端，提出应扩大地方和工厂的权力的意见。这个讲话中也谈到对外开放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

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抵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5)”。在这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57年11月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3个规定，标志着改革探索的开始。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体制改革经历了带有反复性的几次探索。第一次是1958年前后的下放权力。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而地方以及企业职权太少的状况，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措施一度使地方工业发展很快，企业也有了一定的活力。但“大跃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干扰了这次体制改革，出现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宏观失控，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为了改变经济混乱的局面，随着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强调集中统一。对过去中央下放给省、市、县的人、财、物权重新进行调整，下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同时，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试办了一批托拉斯。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和恢复经济，在短期内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原来体制固有的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并未解决。1964年又采取下放经济管理权的措施，扩大了地方对物资、财政、投资等机动权，收到了效果。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又把体制改革搞乱了。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个时期也作了些探索。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工，改变以党代政的状况；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需要，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发挥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等等。

总之，这一时期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虽未从总体上克服原有体制上的诸多弊端，但为以后的改革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改革中发展，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次全会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多方面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新时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实行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层次上逐步展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又到教育、科技；从局部改革到全面地配套改革，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掀起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而且步步深入，方兴未艾。这次改革使经济体

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总体上开始克服原有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围绕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结构,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给工商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以较大的自主经营权力,极大的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大发展。

新时期的改革也在政治领域逐步展开。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这就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多方面展开,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的实惠最多。以1990年同198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2.5%,美国、欧共体、日本分别为3%、4.2%和2.2%,发展中国家平均年增长为3.2%。我国一些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粮食、棉花、肉类、布匹、煤炭、水泥已居于世界第1位,钢、化纤、有色金属、发电量居于世界第4位。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我国11亿人民的绝大部分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地区的人民达到了小康水平;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80年增长55.1%和123.9%。人民的食物结构向营养型过渡,衣着绚丽多彩,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已进入相当一部分城乡人民的家庭。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非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失败的产物,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取得新成功的推动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新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旧制度,用主动的事实论证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首先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性质决定的:如前所述,我国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在基本适应的情况下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因此,就不需要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必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进行。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他们说，既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由此，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存在着两种主张、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谓的改革开放。这种新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这里必须划清我们要改什么和坚持什么的原则界限。我们要改的不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也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经济基础，这些都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不但不改，而且要坚持。我们要改革的是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方面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从基本制度到具体体制都能充满活力。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混淆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界限，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挑起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是1979年初党的理论务虚会前后，当时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要求实行他们请卡特(美国)来中国当总统的“社会改革”。第二次是1986年底的学潮前后，那时方励之等人到处煽动，极力鼓吹“全盘西化”。第三次是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制造动乱的“精英”们，在思想上主张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主张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济上主张私有化，改变公有制为主体这个社会主义基础，一句话，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回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发起的这几次进攻，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捍卫了我们用两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都证明，对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不能手软。对于他们制造的混乱必须及时加以澄清，划清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只有如此，才能“治小乱，以防大乱”。否则任凭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改革开放中把手搅浑，就会出现长期的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生产倒退，生活下降，使社会主义改革走向失败。如果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上，人民用鲜血赢来的政权得而复失，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压迫的对象；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公有制被否定，社会财富重新被剥削者所占有，劳动人民成为剥削者的奴隶，并形成庞大的社会失业群；在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重新占据主要地位，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海阔谋杀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这将是一种可怕的情景。因此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经验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世纪还要继续进行”（6）。他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三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7）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经历如此长期的斗争呢？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新事物才有几十年的历史。同资本主义世界比较起来社会主义还处于相对比较弱小的地位，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这种国际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将利用他们暂时的经济优势，利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机会，通过施加经济政治压力和思想渗透等办法，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而国内总会有些人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从国内条件来说，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封建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对发展我国经济是有益的。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就存在着差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还有些以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人，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一旦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煽动起来、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一股反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再次，社会上这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必然有所反映。如果在共产党自身建设上发生失误，党内的右倾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就有亡党和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危险。这一点在国外已有教训足以戒。

有的同志认为，经过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斗争，似乎反自由化的问题不那么尖锐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在今天，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不大有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并未停止，逃到国外的动乱“精英”们还在蠢蠢欲动，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理论是非还远没有得到澄清，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看到，在上述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某种适宜的气候出现时，还有可能抬头。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要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必须在实际工作上处理好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既要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勇于推进改革开放，又要善于掌握社会主义原则，使改革开放不走偏方向，这就需要经验的积累。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经过10多年来的实践，全党对于改革开放的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对这个关系的处理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今后的改革开放将是有益的。这些经验主要是：

第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原来长期流行的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同时又坚持和发扬过去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好经验、好传统、好做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即根据会议精神，领导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旧体制中的弊端进行大胆的改革。例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努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采用多种分配方式；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中央在打破一些不符合我国实际的传统观念、传统模式，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的同时，又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盘否定，而是继续坚持和发扬已有的正确方面和传统优势。例如，在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强调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中力量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和主导作用；在注意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又注重发挥计划调节的作用，并使两者相结合；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富起来的同时，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提倡和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地区和企业，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和企业共同富裕起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围绕建立提高效率、增加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个目标，既着眼于改革和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活力的弊端，又强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保持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等等。

第二，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界限，以防止改革开放走偏方向。诸如，在经济改革蓬勃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应运而生，对外开放造成沿海地区人民首先富起来的形势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及时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⁸⁾。当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有人主张仿效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时，邓小平又指出，“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⁹⁾当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进展而西方腐朽思想乘隙而入时，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许多领导同志还一再强调，在思想领域，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搞轮流坐庄的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私有制为主体。正是由于党中央及时地划清了各种原则界限，才使改革开放保持了正确的方向。第三，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正确地加以引导。这在农村改革中表现得最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倡建立生产责任制，但提倡的是责任到组、包工到组，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但责任到组、包工到组只打破了组与组之间的平均主义，并没有打破作业组内部的平均主义，因而许多地方在实行过程中，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又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这种责任制形式，当时认识很不统一，有的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怀疑它姓“社”还是姓“资”。党中央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这种责任制形式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由于党中央的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以普遍实行。但是，党中央在给予支持的同时，并不是撒手不管，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及时地、正确地加以引导，强调在承包到户时不要“一刀切”，要保护好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群众的意见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等等，从而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完善，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不是变成“分田单干”，不是等同于合作化以前小私有的个体经济。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开放不致影响而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人们原来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秩序逐渐被打破，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影响改革开放的进行，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党中央在制订改革开放的规划、方案和措施时，既强调改革开放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为其提供的现实环境和基础，注意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并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调整、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以保障经济的稳定、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例如，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陈云就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地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之而行。”（10）邓小平也提出：进行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11）。他还说，“我们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

步前进。”(12)他还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一定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否则什么都搞不成。正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党中央一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改进改革开放的措施和步骤，一出现不安定的因素就及时加以排除。例如1988年由于物价改革过急，诱发了抢购和提款风潮，中央立即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以与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及配套措施不全，致使大批“官倒”、“私倒”出现，经济领域特别是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中央立即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措施；1986年底发生学潮和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以后，中央都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平息。正是由于中央正确处理了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才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五，从实际出发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排除“左”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当长期的“左”倾僵化思想还束缚人们头脑、改革开放不能迈出步伐时，党中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打破“左”的思想束缚，克服僵化观念，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党中央的这一号召成为强大的振动力，使改革开放迅速开展起来。而当坚持搞“全盘西化”的人想利用改革开放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邪路时，党中央和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并且尖锐指出，他们是“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13)当有的中央领导人由于忽视和放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改革开放出现曲折和失误的时候，党中央又及时地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以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才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六，从总体和长远考虑，采取若干战略措施，以保证改革开放持久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把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也是下一代人的责任，因此从总体上、长远上采取一些战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在1989年我国取得反自由化和平息政治风波胜利之后，党中央便从长远需要出发采取了一些战略步骤。其一，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具体化和制度化。包括建立全党首先是党的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学习制度，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一度出现的淡化党的领导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偏向，把党的领导深入到各个领域，使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化，加强和改善宣传教育工作，派出得力干部充实队伍，使这些阵地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继续扩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对反社会主义势力实行强有力的专政。其二，努力培养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力争

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法学家以及各行各业坚持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其三，加强高层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这个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领导层，绝对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中央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以后的改革开放大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3页。
- (2)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63页。
- (5) 同上，第740、742页。
- (6)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1页。
- (7) 同上，第10页。
- (8) 《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9页。
- (9)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月）》第39页。
- (1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04页。
- (11) 《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6页。
- (12) 同上，第156页。
- (13)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27页。